

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 东方社会

The Oriental Society
under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于金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 东方社会

The Oriental Society
under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于金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东方社会/于金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161 - 9129 - 3

I. ①亚… II. ①于… III. ①亚细亚生产方式—关系—社会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220.7 ②F0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255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426 千字
定 价 9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言	1
-----------	---

第一篇 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理论

第一章 唯物史观的基本硬核与崭新形态	13
--------------------------	----

- | | |
|----------------------------------|----|
| 一 唯物史观的基本硬核——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 14 |
| 二 唯物史观的最初形态——基于欧洲社会历史的西方史观 | 17 |
| 三 唯物史观的最新形态——基于亚洲社会历史的东方史观 | 22 |

第二章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继承与创新	31
-----------------------------	----

- | | |
|---|----|
| 一 三大社会形态：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划分的基本原理 | 31 |
| 二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
发展进程的具体结论 | 36 |
| 三 东方社会形态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社会
形态理论的基本方向 | 40 |

第三章 马克思生产方式的经典理论与现代创新	45
-----------------------------	----

- | | |
|--------------------------------------|----|
| 一 生产方式：基本范畴与二重属性 | 45 |
| 二 重要意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地位与决定作用 | 50 |
| 三 重要任务：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科学继承
与发展创新 | 53 |
| 四 重大课题：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 | 55 |

第二篇 东方国家制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第四章 特殊的国家职能与东方国家制度	61
一 东方国家的物质生产方式与国家职能	61
二 东方国家职能与专制制度	63
三 东方专制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67
四 东方国家制度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征	73
第五章 东方国家制度与土地国有制	101
一 确立判断东方古代土地所有制性质的科学标准	101
二 东方国家古代土地所有制是私有制吗?	109
三 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向来是国家所有制	124
第六章 土地国有制下的依附性小农经济	136
一 东方国家小农经济特殊的社会性质	136
二 中国小农经济特殊的具体形式	142
三 中国小农经济特殊的发展规律	146
第七章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二重性质与历史地位	150
一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二重性质	150
二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	154
三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	158
第八章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	164
一 印度: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	164
二 中国: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发展	166
三 俄国: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与俄国特色	251

第三篇 东方社会的基本性质与运动规律性

第九章 东方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质	257
一 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重大差别	258

二 东方古代社会本质上是与西方相同的社会形态——奴隶制社会	261
三 东方奴隶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奴隶社会的固有特征	269
四 东方奴隶制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国家奴隶制	278
五 东方国家奴隶制具有完整的内容结构与制度体系	285
六 国家奴隶制社会是东方自古以来唯一的社会形态	294
七 东方国家奴隶社会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历史形式	298
八 本书研究所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300
九 结论	302
第十章 东方社会的发展趋势	306
一 “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一般规律	306
二 “跨越卡夫丁峡谷”：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及其特殊性	311
三 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与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	315
四 马克思是否要探索“东方道路”	320
五 “苏联模式”与“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	324
六 “委内瑞拉模式”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命运	329

第四篇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基本国情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的论述	335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	335
二 列宁、普列汉诺夫关于中国社会的论述	341
第十二章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基本国情	346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的历史前提	346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的根本原因	352
三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与“李约瑟之谜”	358
四 “张培刚之问”与中国近现代落后的根源	363

第十三章 从历史进程看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368
一 “五千年之文明”	369
二 “三千年之变局”	375
三 “四千年之梦醒”	383
主要参考文献	402
后 记	407

绪 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方式具有民族特殊性与历史继承性。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脱离东方及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实际、照搬基于西方社会历史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来解释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特征及其历史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东方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对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发展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而提出科学的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大力倡导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适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在领导党和国家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尊重民族特殊性与重视历史继承性为核心的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方式。这一科学思维方式不仅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我们进行东方社会与生产方式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研究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民族特色与发展历史的重要性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重要理论指南。

习近平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强调了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而且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适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应当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把握中国经济特殊的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特殊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国经济社会特殊的运动规律。这一方法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积极倡导的以分析矛盾特殊性为基础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同志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高度重视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与发展历史。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事物和任何运动形式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的特殊的矛盾,从而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根据。只有分析、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及其本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认清中国基本国情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作为根本的国情,中国社会性质即社会形式问题既是制定中国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确立中国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本依据。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强调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强调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强调继承本民族优秀的历史遗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在毛泽东看来,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人类是带着历史的烙印走入现实社会的,又将带着现实的烙印走向未来。今天的中国既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又是明天的中国的一个起点。因此,在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把握上,毛泽东强调“不能割断历史”,必须继承历史的遗产。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方式是以毛泽东所倡导的科学思维方法为基础的,二者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一再强调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高度重视研究每个国家实际国情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一

样,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形成自己特殊的社会制度和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不仅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和每个国家实际国情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且高度重视每个国家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的历史性和继承性。因此,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引经据典,善于从历史中汲取人生智慧和治国理政智慧。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一贯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

讲话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及其治理体系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在现阶段，我们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决定的。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总的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仅大力倡导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在领导党和国家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尊重民族特殊性与重视历史继承性为核心的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方式，为我们学习、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习近平根据其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方式不仅提出了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承认各种文明特殊性的观点，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确立民族自信、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论断；不仅提出了要把新

中国成立以来两个 30 年联结起来进行科学历史评价的重要观点,而且进一步作出了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 60 年历史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 170 多年的历史以及中华文明 5000 年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科学认识的重要论断。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方式及其重要论断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习近平这一科学思维方式不仅是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指南,而且对我们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运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方式去研究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民族特色与历史发展,才能阐明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征,揭示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趋势,从而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构建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 东方及中国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

要建立东方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就必须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确认,是确定与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学科学属性的首要因素。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①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科学。不仅如此,政治经济学不是抽象地研究生产方式一般,而是要具体地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生产方式。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97 页。

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和马克思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运用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不同，其生产方式及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地区和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是由这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性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每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生产方式都扎根于本地区、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与特点。从历史上看，在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中国等东方国家同西方国家一样都是实行以土地个人占有与公社所有为基础、以兼有公有制与私有制二重因素为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是当时世界普遍存在的生产方式，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起点。但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历史环境，中国等东方国家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因此，中国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并没有形成同西方一样的社会生产方式，而是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总体上说，东方及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封建制生产方式，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的生产方式。具体来说，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特殊的分工体系、特殊的国家制度、特殊的土地制度、特殊的劳动方式与特殊的剩余索取形式。从其分工体系来看，一方面是国家负责组织提供兴修水利灌溉工程等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另一方面是分散的小农以个体劳动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从国家制度来看，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制度与社会管理制度。从土地所有制来看，一方面实行集体占有或个人占有，另一方面国家始终作为“最高的地主”而拥有土地所有权。从劳动方式来看，一直实行小农个体劳动与分散经营方式。从剩余索取形式来看，国家一直实行“租税合一”的剩余索取形式。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东方及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社会生产方式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一是东方及中

国在进入阶级社会时期所处特殊的地理环境；二是东方及中国在进入阶级社会时期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马克思基于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特殊的地理条件阐明了亚洲国家职能与国家制度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亚洲特殊的农业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亚洲社会（包括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等）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于西欧社会。在那里，“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亚洲社会特殊的社会分工与物质生产方式。从地理环境方面来看，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决定大规模的农业人工灌溉成为农业生产基本的必要条件；从社会环境方面来看，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有效地管理水利工程，需要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机构。亚洲独特的地理条件与社会条件决定了治水与灌溉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公共工程既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领导，又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行政机构来具体组织、协调、监督与管理。这一特征深远地影响到亚洲与东方国家的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路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可见，亚洲社会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分工这一物质生产方式必然要求国家执行更多更强大的经济职能，因而需要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机构和强有力的最高领导者。因此，亚洲特有的社会分工必然要求实行集权型的国家制度、实行土地国有制，从而必然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很显然，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是由特殊历史环境所形成、具有特殊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它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突出特征就是在个人占有的基础上实行集体所有、在集体与个人占有的基础上实行国家所有，在国家强有力的经济职能下进行局部劳动

与自主经营，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其最主要特征。从中国社会历史事实来看，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尽管中国一直存在着集体占有权与个人占有权，但始终不存在集体所有权与个人所有权，国家一直拥有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绝对支配权与收益索取权。自古以来中国既不存在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完全占有奴隶为特征的奴隶主阶级，以及以“国中之国”、剥削农奴为特征的封建主阶级，也不存在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阶级与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为封建主提供徭役劳动的农奴阶级。可见，东方及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封建制生产方式的特殊的生产方式，那种用基于西方社会生产方式特征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来解释东方及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做法，是一种不科学、不符合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作为东方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不仅应当以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而且应当跳出基于西方社会历史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窠臼，立足于中国实际国情，着力研究长期、普遍存在于中国及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阐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性质、主要特征与运动规律。

三 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 发展——具有特殊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生产方式的具体的科学，而且是研究各种生产方式历史发展过程的历史的科学。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和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总会以某种方式出现在当今社会生活之中，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也是如此。历史事实证明，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不仅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特殊的生产方式，而且也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历史连续性。数千年来，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走着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和民族的生产方式发展道路。西方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一条新陈代谢、推陈出新的“革命”道路，先是封建制生产方式取代奴隶制生产方式，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封建制生产方式。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

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一条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维新”道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传统，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也是在不断改革维新中自我发展、长期延续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尽管发生了上百次农民起义、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改朝换代、进行了多次变法改革，但以东方专制制度为核心、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以国家承担水利灌溉工程和小农个体经营为基本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一直没有根本改变。随着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变化，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也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与发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变化。具体说来，在夏商周时期的上古社会，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不是像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而是以土地公社占有与国家所有为基础、以自然经济与农业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次生形态。在秦汉以来的中古社会，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不是像欧洲中世纪那样以领主所有制为基础、以农奴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制生产方式，而是以地主占有与国家所有为基础、以依附性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生产方式，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延续与变异，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继生形态。中国古代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改革维新与始终存在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只有发展程度与实现形式的变化，而没有发生根本性与颠覆性的变化。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战国时期以商鞅变法为主的社会改革运动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建立了新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站不住脚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作为中国及东方国家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在东方及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而且作为东方及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基因”“潜质”仍然存在于中国近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无论是太平天国所实行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是孙中山倡导的土地国有、耕者均占的“耕者有其田”政策，都属于土地国有、授田分耕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范畴。在我国现阶段，作为具有 5000 年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仍然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会改弦更张、全盘西化，不会全面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我们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结果，而且是由我国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的历史传承及其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必然结果。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中国及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与历史性，不仅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且使我们能够科学地对待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的文明成果，以史为镜，古为今用，兴利除弊，真正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适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模式，从而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胜利，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